

不舍集

张岂之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张岂之

著

不舍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8N08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舍集 / 张岂之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ISBN 978-7-5613-9963-7

I. ①不…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6870号

不舍集

BUSHE JI

张岂之 著

出版统筹 / 刘东风

选题策划 /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谢勇蝶 胡杨

责任校对 / 杨 雯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 5.75

插 页 / 2

字 数 / 100千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963-7

定 价 / 3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序言

我的学术随笔《春鸟集》于2017年5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后，我即着手整理另一本学术随笔《不舍集》，仍然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出版。

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约前298—前238年），在《劝学》篇中有这样的名言：“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里，荀子阐述了一个真理：泥土积累成为一座山，风雨由此兴起；水积成深渊，这里出现蛟龙；人积聚善行，成为美德，智慧聪明也由此产生。因而不从积累半步一步开始，走不了千里之遥；不积若干细小的支流，也形不成汪洋大海。一切皆形成于积累。由此可知：如果人们不

能坚持做一件事，就不能做成任何事情。以雕刻为例，如果刻一下就停止，即便是朽木也难以刻透；只有不间断地雕刻，即便是金石也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总之，荀子在《劝学》篇中所讲的道理，集中到一点上，就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我的这本学术随笔集，公开出版，经过了较长时间。早在2008年1月，西北大学校友吴小强同志在广州大学教书，他编了一本校友间传看的内部文稿集，名《张岂之先生随笔》，其中有些文章，我此次收进《不舍集》中，在此表示对小强校友的感谢。

《不舍集》成书，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夏绍熙博士在稿件的整理和编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减轻了我的许多负担，谢谢他。

張 豈 之

2018年3月于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录

通论

- 002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 019 大学素质教育与中华传统美德
- 03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读书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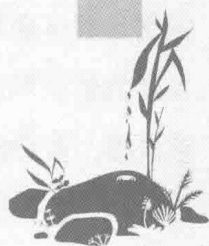
- 040 怎样读《孟子》?
- 050 《十三经注疏》的学术价值
- 054 评荐《清通鉴》

- 058 我读《经史说略》
- 062 从一本书里想到的文化问题
- 069 读《中国文化史要论》
- 073 大学：“文化中心”“经济中心”？
- 076 《众妙之门》序言
- 079 《中国古代医学伦理道德思想史》序一
- 083 历史与文明
——《中国历史十五讲》序
- 087 素质教育图书该是什么样？
- 092 《城市国学讲坛》第一辑序

思想文化研究

- 098 “理学”的开端：二程的《易》学思想
- 117 论明代刘蕺山学派思想的贡献
- 131 17世纪清朝初期中国学术史上的两大家：
东南的黄宗羲与关中的李颀
- 13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与道教文化
- 149 陕北文物点考察记
- 163 忆《宋明理学史》的撰著
——邱汉生先生对《宋明理学史》一书的贡献

通论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个论述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总概括，也是我们对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信念。

一、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明史深刻认识的体现

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没有中断的历史，这是我们关于文化自信的坚实立足点和出发点。众所周知，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历代在这里祭祀人文初祖黄帝。2015年2月，习近

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对此加以阐发，使更多的人了解，从而建立坚实的文化自信基石，这是十分必要的。

“文明”一词不是外来语，《尚书·舜典》中的“浚哲文明”，指治国理政者应当具有文明的美德。唐代孔颖达《疏》的解释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中华历史文献中，对“文明”的赞美很多。与“文明”相对的是愚昧野蛮，由此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这一直是中华儿女熟记于心的箴言。

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的时候，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模式，走了与西方古希腊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的文化血脉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

共六家。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中国历史上出现“百家争鸣”，有其历史条件。战国时代，“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有些人则出身于平民阶层。“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中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这种古代社会的变动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的繁荣。

儒家创始人孔子着重论述关于“仁”的思想，将“仁”解释为“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在“君子”（有道德修养的人）的生命中，恪守道义是必不可少的。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些才体现出君子的人生价值所在。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早论述人生价值观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他一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的事迹上。

秦汉之际有一部书，名《礼记》。《史记·孔子世家》说它是孟子的老师子思的著作。后来，《礼记》中的一篇《中庸》

受到唐朝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推崇。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称为“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对元明清三朝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庸》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称为“诚”。从自然界看,“诚”是四季、昼夜的更替,按天道规则运行。君子与此相应,按规矩做人办事,不得妄为。这也就是说,君子在自尊、自信、自律、自省上应有所建树。为此,《中庸》强调君子应“博学之”(广博地学习)、“审问之”(详细地向人请教)、“慎思之”(周密地思考)、“明辨之”(明确地区别是非善恶)、“笃行之”(切实地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孙中山先生赞赏《中庸》上述五种学习方法,曾经手书赠给广州中山大学,希望师生们以此为学习的座右铭。

先秦诸子中对自然科学研究最广泛、深入的是墨家。墨子是墨家的创立者,他和他的后学建立起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它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春秋末期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们的创新思路。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造成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

墨子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学派后来中断，未能传承下去，但墨家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尚贤”的文化思想被后代继承发扬。

哲学是时代的反映、民族文化的灵魂。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深入研究“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开创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在老子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则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老子》书（又名《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

虽稀疏但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事物都囊括在其中。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不公。于是问题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

老子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绚丽画卷，反映出哲人的智慧和洞察力。毋庸讳言，老子哲学用自然的“天道”否定“人道”自身的特点，在理论上有其偏颇的一面。不过，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封建社会的治理者在一定范围内将老子哲学的某些方面加以实行的时候，确实有过若干成效。

三、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色

在中华文明中，政治文明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后，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产生，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这反映在逐渐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春秋时期，秦、楚等国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官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国家管理人员由职业官员取代了世袭领主。

战国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集权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建立起由君主执掌大权、卿士执行的制度，实行“耕”“战”并重的法家政策，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秦王朝（公元前 221—前 206 年）实现了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意义重大。

一个王朝，在治国理政的政治措施中，最主要之点是：如何选拔辅佐皇帝治国的百官臣僚。这在中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代以察举（即推荐官员）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解决了战国以来军功制和养士制不适应治理国家的问题，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由夺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

隋、唐时期在官吏的选拔上有新的进展，创建了科举制。这种制度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的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科举制力求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知识化，

使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相结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得到唐代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得到以后各个王朝的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选官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有特色的内容，反映了它们在历史演变中能够修复完善并自我发展，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这两个支柱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民族间